

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及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王
火
灿

贸易保护主义并未因乌拉圭回合带来的贸易自由化的强化而退潮,反而可能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而更趋猖獗,并假借“多边的”、“环保的”、“人权的”和“技术的”各种外衣而出现。由于我国的特殊性 & 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特殊政治图谋等原因,西方国家会更多地采取反倾销、环保、劳工标准、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手段对我国施加压力和贸易限制。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我国应从“外交”和“内政”两方面着手,苦练“外功”与“内功”。

一、贸易保护主义何以与贸易自由化“并行不悖”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历经7年艰辛而最终取得成功,世界贸易组织亦于去年初如期创立,这无疑标志着世界贸易朝自由化迈出了重大一步,预示着一个更为开放的贸易新时代的到来。然而,就此便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将偃旗息鼓,那就未免太轻率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叫嚣声并未被贸易自由化的声势所吞没,“301大棒”仍时不时地在“自由贸易”的头项上挥舞得呼作响。而环境保护、技术壁垒、劳工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乃至人权等等又似乎在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军火库里添置着新的武器。正当全世界为世贸组织的创立欢呼之时,美中因知识产权问题先后亮出报复与反报复清单;而欧加渔业争端亦到了要“火拼”的边缘;一波未息,美日汽车贸易谈判又波澜骤兴……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化如此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似乎令人费解,其实毫不足奇。

就多边贸易体制而言,贸易自由化是其所倡导的基本原则;而对各国来说,贸易自由化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试图从中获取利益的手段。然而,贸易自由化在促进货物与服务的跨国流动的同时,必然带来各国商品与服务之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市场的重新分割,资源和生产的重新配置,进而导致各国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一旦竞争与调整损害到或威胁到(那怕只是短期的)某些与进口相竞争的生产商或行业,保护主义便应声而出。何况贸易自由化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竞争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而必然在一个利益多样化、发展水平多极化的现实世界上才得以展开,因而也就不可能每每带来利益的普遍的均等的增进。竞争必然在优胜劣汰中进行,利益会在此得彼失中调整;贸易愈自由,竞争便愈激烈,利益的调整也愈加剧烈。由此看来,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还高于一切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不但不会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而销声匿迹,甚至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只不过,它会不断改头换面,会披挂新的外衣,假借新的途径,继续在国际经贸领域兴风作浪。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

二、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征

总的说来,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更趋隐蔽性和伪装性,常常披着各种各样表面看来似乎“合法”的外衣。

其中之一便是“多边外衣”。现代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多地利用多边规则及其存在的例外、不足或空子来推行保护措施,如利用多边的反倾销协议或知识产权协议等实施反倾销或保护知识产权措施等。由于多边规则本身亦是各参加方讨价还价和妥协的结果,并往往为实力大国所左右,其本身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既可有合法的例外规定可利用,亦可有各种空子可钻。然而,既然多边规则为大家所遵循,借此来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便显得冠冕堂皇,因而也就更难对付。

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借重的另一件外衣便是“环境外衣”。由于环境保护运动已成为世界性潮流,具有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借此外衣,便可摇身一变,以“全人类利益”的维护者面目出现,从而显得更为堂皇、“正义”和“合法”。

同样,“人权外衣”亦具有类似性质,成了保护主义日益喜欢的第三件外衣。近来发达国家热衷于劳工标准和劳工权利,就在于借此既可与所谓的“社会倾销”挂钩,又可与“人权”相联系,披上这件外衣,保护主义者便变为“人权”的卫道士,其欺骗性和迷惑性是显而易见的。

保护主义日益借重的第四件外衣便是“技术外衣”,即借助诸如环境法规与标准、包装和标签要求、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以及认证程序等技术性法规与标准,对贸易设置技术壁垒,达到保护的目的。

总之,在明目张胆的单边主义受到牵制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会更多地借用多边途径或世界性潮流来寻找“合理”的保护手段和途径。但这不意味着单边主义的消失,一旦披不上“合理”的外衣,双边谈判又未能奏效,就会不惜采用单边主义的报复或制裁手段,正如美国的“301大棒”所表现的那样。此外,从总体上看,以西方国家为主流的现代保护主义,其矛头大多对准发展中国家,使倚重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而我国作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在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宰的国际市场中,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我国之所以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是因为我国除了要面对发展中国家通常所要面对的一般挑战(即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挑战和潜在的保护主义挑战)之外,还必须面对特有的挑战,这是由我国的独特性及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独特态度”引起的。我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使西方国家的对华经贸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在西方眼里,我国是仅存的一座社会主义“大孤岛”,因而是“和平演变”的首要目标。这样,西方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对华经贸战略和政策时,不可避免地將政治图谋掺杂于经济目标之中,甚至置于经济目标之上。它们不仅想打开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而且想最终促使我国走向全盘西方化的所谓“市场民主主义制度”。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图谋,不仅使贸易常常沦为“和平演变”的工具,而且必然会与我国的现实和政治原则相冲突。这可谓是我国所要面对的西方保护主义的独特的“政治挑战”。

此外,西方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对待我国经济发展上表现出复杂的矛盾心态。它们对我国经贸近些年的神速发展既惊讶又羡慕,并对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抱有强烈的向往,但同时又心怀不安,随之泛起了一股“中国威胁论”的思潮。一些西方国家把我国说成是“出口机器”,视作潜在的对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既羡慕我国的高速增长,又害怕我国成为它们的巨大竞争对手,挤占它们在国际市场中的已有的或潜在的位子。一旦这种“恐华论”左右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遏制中国”就会成为这些政策的总基调、总目标。这对我国自然是极为不利的。无论是“和平演变论”还是“中国威胁论”,它们都对我国的对外经贸发展前景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对华心态,使我国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严峻。尤其在我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况下,我国将在缺乏多边保障的情形下独自面对这些挑战。而事实上,我国之所以经历了9年多的漫长谈判而至今还不能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正式成员,正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复关问题上采取的政治立场所造成的,正如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1994年11月撰写的、据悉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贸易代表制定对我国复关的谈判策略定了调子的一份报告中所言,“考虑到美国对中国申请加入关贸和世界贸易组织命运的强大影响,考虑到中国要求加入的强烈愿望,这是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施加影响的空前无比的好机会。确实,这也许是美国最后和最好的压中国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的机会。”并且认为,如果中国在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也就是符合美国标准的改革)的前提下便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在没有从中国手中“赢得足够和具体的减让”的前提下便给予中国“彻底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那么,“美国将失去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改革的最佳时机。一个社会主义的孤岛将在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得以在世界经济中生存。”而且中国“将不再有动力脱离共产主义,中国的市场准入也得不到保证”。正是在这种政治心态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才在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上横生枝节,并对我国复关提出漫天要价,使我国复关一拖再拖,没有尽期。因此,我国复关谈判从一个侧面检阅和印证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对华政策上的独特政治心态,并从另一侧面预示着我国未来对外经贸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来自西方的挑战的严峻性。

四、我国应采取的总体对策

在这世纪交替之际,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走向强盛的关键时期。我国要实现富强的梦想,需要国民经济和对外经贸不断取得巨大发展。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历史在赋予我国各种机遇的同时,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将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在此,笔者提一点个人的浅见,以抛砖引玉。

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说,面对主要来自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重重挑战,我国必须在改革开放的总旗帜下,从“外交”与“内政”两方面着手,苦练“外功”与“内功”。

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指示下,推行多边与双边、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全面外交政策,利用西方国家在对华政策上政治理想与经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与反华、“限华”势力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努力为我国经贸发展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1. 全面外交政策 首先,在双边关系上,既要继续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关系,亦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其次,面对世界经济地区化、集团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我国必须在加强双边关系,尤其与亚洲周边国家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以亚太经济合作为重点的区域合作。第三,要尽一切可能克服困难,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力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一时难以加入的情况下,亦要多利用我国已加入的其他国际多边论

坛组织来争取和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2. 打好“市场牌” 巨大的中国市场几乎为所有国家所看重。不仅美国已将中国市场列为其“出口战略”的十大目标市场之首,而且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亦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可以说,“中国市场”是我国手中的一张“王牌”,打好这张牌,可以增加我国的谈判实力和反报复力量。并在必要时用这张牌来激化西方国家在对华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与冲突,瓦解其政治上可能一致对华的统一阵线。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近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分歧在增大,关系在转变,这给我国一个打“俄国牌”的机会,因此,搞好中俄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起到制衡作用,减轻西方对华压力。

3. 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应避免给人以想争当发展中国家“领导角色”的印象 鉴于我国目前的处境,易被西方国家视为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对手,加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对华心态上具有矛盾心理,故我国应在国际上尽量避免当“出头鸟”。尽管在双边和多边论坛中,我国理当维护自身的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不要给人以想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角色”的错觉,这有助于减少反华、限华的压力。

4. 加强国际公关宣传,树立新的中国形象,清除“恐华论” 这既要通过双边与多边、官方与非官方的各种途径进行积极主动的自我宣传,亦要假借国际有识之士、资深人士和亲华人士为我国进行宣传,树立一个“和平的、合作的、负责的和民主的”中国形象。

自觉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积极主动地与国际市场规范接轨,加强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企业内在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为最终实现富强之梦而自强不息。

1. 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进出口管理体制 毋庸多言,改革与开放是我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内在要求,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从发展对外经贸事业来看,也只有通过深化包括外贸体制在内的经济改革,才能最终建立起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具有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现代企业制度,为发展奠定微观竞争基础。而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相平衡的进出口管理体制,则既能使国内企业感受到适度的国际竞争压力,又能为进出口贸易建立必要的秩序,消除不正常的企业竞争行为引起市场扰乱和贸易纠纷。

2. 积极主动地与国际接轨,自觉按国际规范与标准办事 与国际接轨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是走外向型发展道路、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内在要求。与国际接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与国际通行规则 and 标准接轨。为此,首先要在熟悉和掌握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按国际准则制定和健全国内的法规、标准体系。其次要加快国际标准化步伐,变国外技术标准壁垒压力为动力,努力使国内标准向国际标准靠拢,加强企业的标准化认证工作。再次,还应提高法规和标准的透明度,建立必要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提供国内国外法规、标准等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最后,还要加强法律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国际法律人才的培养等。此外,还应提高企业的“国际法意识”,既要督促企业遵守国际规范,又要敦促企业在遇到国外的不公正对待时,积极寻求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大力推进市场多元化和“大经贸”发展战略 首先,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出口商品多样化战略,通过尽可能广泛地拓展地域市场空间及增加出口品种,以克服出口结构的畸轻畸重及其潜在的风险性与不稳定性。其次,更重要的是,通过推动产品结构的高级化发展,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质量档次,从而摆脱过分依赖价格竞争带来的不利局面。最后,从现代的货物、服务、技术和投资相结合的“大贸易”思想出发,推行“大经贸”战略,促进商品、

资金、劳务和技术等各种要素和资源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双向循环交流,以便充分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获取发展效益,并最终实现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真正一体化。

4. 制定实施绿色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使其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保护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应当看到顺应世界环保潮流是符合我国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的。因此,制定实施绿色产业战略,开拓日益增长着的绿色产品市场,是积极获取世界环保潮正面效应的主动策略。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亦应密切关注和研究国外环保动向及其对我国出口的潜在影响,并应通过双边或多边的途径反对和制止不正当的环保壁垒,维护我国的正当贸易权益。

5.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具有核心地位。加强人才培养与科技队伍建设,增加科技投入,推动科技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应用,这是使我国最终走上以质量取胜的国际竞争道路的 necessary 保证。有鉴于知识产权保护对科技发明与创造的重要性,我国有必要顺应日趋强大的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潮流,继续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与司法,加强对国内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推动技术进步与技术贸易的双重发展。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打击别国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侵害行为,维护我国的利益。

6. 按国际惯例重塑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强化政府的基础服务功能 在与国际市场接轨过程中,随着合乎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通行准则的宏观管理体制的建立,我国政府应转变职能,对企业的支助应重点转向为国际多边规则所允许的基础服务,如信息、教育、科技及其他公共服务等,以便能为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助一臂之力。

(上接第8页)

省、市政府可派员到使领馆参加工作。对派驻海外人员的待遇可改行国外工资制,参照所在国的工薪水平确定工资标准;并延长其驻外工作年限,不必套用外交人员的规定;也允许其携带家属,以使队伍相对稳定,有利于熟悉情况,开拓业务。

(七) 实行配套改革,密切各方协作 这是实行企业集团化、国际化的外部条件。改革的重点应从过去“减税让利”、“普施优惠”转向协同行动,便利经营,由外部输血转到内部造血,以促进其自身的快速发展。改革的主要方面有:(1)扩大商业性银行的功能,准许其对企业集团进行投资。(2)对经营一时有困难的集团,可予短期的税收优惠。(3)银行信贷应向企业集团倾斜,必要时给予低息优惠。(4)准许有条件的集团开立现汇帐户,自行调度其持有的外汇。(5)财政部门应审查有的集团还有一部分银行挂帐,对其中的政策性部分应给予核销,对经营性部分则责成其限期弥补。

(八) 加强政治工作,培养专业人才

政治工作是各项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企业实行集团化、国际化、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干部和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观念、全局观念、竞争观念,加强开拓意识、创新意识、效益意识,发扬奉献精神、创业精神、团队精神,在各项工作中贯彻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积极为国家、为企业多作贡献;坚决采取有效措施,清除腐败现象,严惩腐败分子,以发扬清正廉洁的风尚,激励士气,团结拼搏。同时,还须大力开展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增加教育、培训的投入,可与大学合办培训,更应创造条件自办培训,按照发展需要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尤其是既懂科学技术,又会经营管理、精通外语和电脑的复合型人才;还可与国外教育机构或跨国公司合作办学,发挥双方的各自优势,同派教师,合编教材,传授国内外的最新知识和技术,并安排到海外实习,以培养高层次的各类人才,适应企业生产经营的发展需要。